

【学术综述】

袁应泰事迹评述

张君弘

(辽阳博物馆, 辽宁 辽阳 111000)

摘 要 明金辽沈之战, 袁应泰败亡, 于当朝和后世多遭诟病。本文以袁应泰的家世背景、仕途履历为基础, 对袁应泰的治水功绩、优良品质作以归纳总结, 并对明金辽沈之战的历史过程和深层原因作以梳理分析, 力求对袁应泰的一生, 特别是辽沈败亡一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。

关键词 袁应泰; 生平; 功绩; 辽沈之败; 评价

中图分类号 K24 **文献标识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673-7725 (2013) 02-0140-06

收稿日期 2012-11-21

作者简介 张君弘 (1965-), 女, 辽宁沈阳人, 副研究馆员, 副馆长, 主要从事文物博物馆专业研究。

明代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, 皇帝昏庸怠政、朝廷党争不断、财政入不敷出、边关军备废弛, 建国二百余年的大明王朝已呈败象。与此同时, 努尔哈赤抓住历史机遇, 将女真人凝聚在自己麾下, 于万历四十四年 (1616) 建立了生机勃勃的大金政权, 侵扰辽东, 开始了与明王朝的军事对抗。短短几年里, 明朝辽东败绩愈演愈烈, 进一步加剧了明王朝的危机。在这一短暂的历史进程中, 袁应泰不幸被推到辽东主帅的风口浪尖, 无奈地成为辽沈之败的牺牲品, 身后留下“用兵非所长, 规画颇疏”的定论, 并多为当朝和后人诟病。

然而, 历史上袁应泰究竟是怎样一个人? 辽沈之败的深层原因是什么? 这一切都需要对袁应泰的仕宦经历进行全面了解, 并对明金对峙的历史背景进行深入分析, 进而形成较为客观、完整的历史评价。

—

袁应泰, 字大来, 陕西凤翔袁家场人, 出身书香世家。父袁饷, 字俊田, 虽为布衣, 但勤勉好学, 教子有方。袁应泰于万历二十三年 (1595) 中乙未科进士, 初授河南彰德府临漳县 (今属河北邯郸

市)知县。万历二十八年(1600),调任河南怀庆府河内(今河南沁阳)知县。约万历三十三至三十四年(1605-1606)六月前,升任工部都水司主事。万历三十四年(1606)六月,升任工部都水司郎中。后任兵部武选司署郎中。万历四十年(1612)六月,升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参议兼按察司僉事。此间任淮徐河道副使、淮徐兵备参议,升任河南按察司副使,后任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僉事。万历四十四年(1616),升任辽东兵备参政。万历四十六年(1618),调任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。万历四十七年(1619),升任永平兵备按察使。后任山东按察司按察使。泰昌元年(1620)九月,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、巡抚辽东地方、赞理军务兼管备倭。泰昌元年(1620)十月,任辽东经略、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。天启元年(1621)三月二十一日,辽阳为后金攻破,自缢。^①

纵观袁应泰26年的从政生涯,其业绩品格可赞者大凡有四。

一是精于治水,做事严谨。《明史·袁应泰传》记载,袁应泰任临漳知县时,“筑长堤四十余里,捍御漳水”。虽寥寥数语,但联系他日后的为官行迹,仍不难看出,初入仕途的袁应泰通过率领百姓修堤治漳,培养了他深入实际、调查研究的作风,并使他的组织协调能力得到锻炼,为其日后成长和成为治水专家奠定了基础。道光五年《河内县志》记载,袁应

泰调任河内知县时,正值大旱灾年,他毅然决定,重修自宋元以来遭战乱破坏的广济渠,改变这一带干旱缺水状况。在调查研究基础上,袁应泰提出在济源的五龙口凿穿孔山,引沁水入渠的方案。五龙口石质坚硬,袁应泰让工匠们先架薪烧柴加热岩石,再趁热开凿。这条石洞长133米,宽26米,工程用了3年完工。水洞凿开后,袁应泰又用2年时间修建了闸门、桥梁。整个工程历时5年完成。为了加强管理,使水渠充分发挥灌溉作用,袁应泰亲自制定了《广济渠申详条款记》,规定了水渠占地的地界、灌溉制度和处罚罪名。袁应泰还号召沿渠两岸的百姓“多植柳树,以固堤岸”。《明史》中对他在河内县数年的治水功绩作如下记载“穿太行山,引沁水,成二十五堰,溉田数万顷,邻邑皆享其利”。可见,袁应泰重修广济渠,是他严谨求实做事风格的集中体现,也是他一生政绩的一大亮点。袁应泰因此被后人誉为“禹后一人”。袁应泰任淮徐河道副使期间,万历四十年(1612)九月,徐州黄河缕堤决口二百余丈,遥堤决口一百七十余丈。袁应泰与管理中河工部郎中吴大山,会同地方官员,组织民夫四万七千多名,清淤河道,恢复加固遥、缕堤坝二万三千余丈。工程用银87196两,比计划用银节省53300多两。袁应泰任淮徐兵备道参议期间,万历四十三年(1615)冬,山东大饥,数十万灾民奔命淮徐一带。袁应泰一方面采取以工代赈的

①关于袁应泰一生所任职务,明熹宗天启四年追授袁应泰妻子赵氏为“谥命淑人”的圣旨中,共列举12项,但没有明确任职时间。本文通过查阅《明神宗实录》万历三十四年六月至《明熹宗实录》泰昌元年九月记载,结合乾隆二十六年《济源县志》的有关史料,对照“谥命淑人”圣旨,对袁应泰家世所任职务进行一一梳理。文中凡没有说明袁应泰具体任职时间的,均仅见于“谥命淑人”圣旨或在《明实录》中提及,而没有其他史料在时间上的认证。

方法,“设粥厂哺流民,缮城浚濠,修先圣庙,饥者尽得食”,另一方面“更搜额外税及漕折马价数万金,先后发振”,救济灾民。万历四十七年(1619)袁应泰任永平兵备按察使时,辽东战事日益激烈。袁应泰练兵缮甲,修整城池,加强边防设施。凡关外所需粮草、火药等物资,他设法全力供应,支援前线,深得时任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夸奖和信赖。以上事例不难看出袁应泰精于谋划、做事严谨的作风。

二是体恤民情,为官清正。袁应泰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,其父袁饒刻“天地正气”为座右铭,教育子孙。为解决修广济渠所需的资金问题,袁应泰自己出资购买4.67公顷土地,每年的地租用于河渠的修建和维护。他又裁减县衙中5个差役的编制,解决了4名闸夫工资问题。袁应泰转迁南直淮徐监司期间,时逢袁饒寿诞,袁应泰派人从徐州给父亲馈赠新采的茶叶和精美的丝绸衣服祝寿。袁饒严词拒绝,将原物退回,并寄语袁应泰“汝自官舍赠我礼物,徒增吾羞”,勉励儿子清廉为官。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看出,袁应泰严守“天地正气”之祖训,心系百姓,克己奉公,在明代晚期政治黑暗、官员腐败的官场中独树一帜,实为难能可贵。

三是坚持原则,勇于担当。在兵部武选司署郎中任内,面对数百起武职世袭过程中弄虚作假的案件,袁应泰秉公执法,“汰遣假冒世职数百人”,表现了铁面无私、敢于坚持原则的精神。在淮徐赈灾中,袁应泰为了拯救灾民,冒着被撤职的

危险,在没有朝廷批准的情况下,增加税赋,动用朝廷款项用于救灾,又进一步表现了他关键时刻不计个人得失、勇于担当的优秀品格。为此他曾遭户部弹劾。

四是恪尽职守,义胆忠肝。当辽东事急,袁应泰受命于危难之际,毅然奔赴辽东前线。当辽阳城破,一些贪生怕死的官员逾城逃命的危急时刻,他从容自尽,实现了他以身报国的誓言。袁应泰的义举传到家乡,其父袁饒悲而矜之,说“我平素以天地正气教子,天地正气充塞吾家”。袁应泰之子袁楷官至河南参政,后辞官家居,清顺治十年(1653),曾婉言谢绝出仕,可见袁应泰为国捐躯对袁氏后人产生了深刻影响。^①

二

万历四十七年(1619),萨尔浒之战败后,明朝任命多年巡按辽东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,以期扭转战局。熊廷弼上任后,严明军纪,调兵遣将扼守冲要,同时督造军器,修缮城堡,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,形成了一年多时间与后金的对峙状态。时任辽东巡抚的是周永春。然而,熊廷弼的“固守渐进”之策并未得到朝廷认可。阅辽给事中姚宗文以私怨“疏陈辽土日蹙,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”。接着御史顾造、冯三元、给事中杨涟纷纷对熊廷弼群起而攻之,谓其“出关踰年,漫无定策”,“欺君”,“无谋”,恃尚方宝剑“逞志作威”。御史舒荣都亦弹劾周永春“受事以来,所失城堡不可胜数”。

①关于袁应泰任职辽东前的事迹,凡重要的,在文中直接表述文献出处,其他见《明神宗实录》万历三十四年六月至《明熹宗实录》天启元年三月、《明史·河渠二》、乾隆二十六年《济源县志》、清道光五年《河内县志》、1991年《凤翔县志》。

泰昌元年（1620）九月，朝廷任命袁应泰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代周永春巡抚辽东。不久辽东经略熊廷弼被迫辞职。泰昌元年（1620）十月，朝廷命刚刚升任辽东巡抚一月有余的袁应泰接任熊廷弼职务。袁应泰提请“辞免新命”，而未获朝廷允许。在此情况下，袁应泰被迫接任辽东经略，“即刑白马祀神”，并上疏言：“臣愿与辽相终始，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，与臣相终始。有托故谢事者，罪无赦”，表达了以身报国的决心。刚刚即位年仅16岁的明熹宗甚为高兴，赐袁应泰尚方宝剑，对他光复失地寄予厚望。

袁应泰赴辽就任后，马上调整军备，查贪官，调兵士，以提高军队战斗力，并着手制定反攻计划。泰昌元年（1620）十二月，袁应泰提请朝廷“升蓟镇东协参将姜弼为副总兵援辽”，诛杀贪将何光先，拘捕查抄伊子、何起虎，免去总兵李光荣、副总兵郭有光、曹登衢等十余名将领职务。天启元年（1621）正月，提请“摘调各镇家丁一万名，赴辽应用”。同时调整军队布防，制定了以收复抚顺为目标的作战计划。

天启元年（1621）二月，因上年蒙古大旱，大量蒙古灾民入辽乞讨。袁应泰下令招降，将他们安排在辽阳、沈阳，与汉民杂居，其中驻防沈阳的总兵贺世贤纳降三千余人。当时有人提出收降过多，恐为敌所用，成为后金内应。袁应泰坚持认为，如果不收降他们，他们就会归后金。在三岔儿之战中，袁应泰用这些蒙古人为前锋，有20余人战死。袁应泰以此为例，打消了大家的顾虑。

天启元年（1621）三月十日，努尔

哈赤亲率大军进攻沈阳，以轻兵引明军出战。三月十二日，总兵贺世贤出城迎战，遭后金重兵包围，战死。三月十三日，后金军攻城，那些归顺的蒙古人果然做了内应，他们砍断城门桥绳放下吊桥，后金军涌入城内，攻破沈阳。镇守辽阳的袁应泰火速派军增援沈阳。援军行至浑河，遭遇后金军，双方展开大战，明军败。袁应泰急请撤虎皮驿、奉集堡兵，回守辽阳。三月十九日，后金军进至辽阳城东南角，于城南七里安营扎寨。努尔哈赤见辽阳城池坚固，明军守备甚严，遂遣少数人马渡太子河，诱骗明军出城作战。袁应泰见后金兵马少，率军出城迎战，结果中了埋伏，被努尔哈赤杀得大败。三月二十日，努尔哈赤下令发起猛攻，鏖战多时，明兵又败。袁应泰撤入城内，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兵守城。关键时刻监军太监高出、牛维曜、胡嘉栋及督饷郎中傅国，却逾城逃跑。三月二十一日，后金军乘胜进击，与城内的奸细里应外和，攻入城中。傍晚，小西门火药起火，各军窝铺、城内草场俱焚，守城军士溃乱。袁应泰组织抵抗，又败，退至城东北镇远楼，知已无力回天。他仰天长叹，对身旁的辽东巡按张铨说：“公无守城责，宜急去，吾死于此”，遂身佩御赐尚方宝剑和官印自缢。随后内弟姚居秀亦自缢。仆人唐世明放声痛哭，纵火焚楼殉国。辽阳城破后，后金势如破竹，连陷七十余城，辽河以东尽入后金。

辽阳失陷，朝野震惊，对袁应泰一片诋毁之辞。其子袁楷一路赤脚上京陈冤。熹宗闻知，于天启三年（1623）下诏恢复袁应泰名誉，准予祭葬，并许袁楷得荫封。天启四年（1624）九月三十日，追

授袁应泰妻子赵氏为“诰命淑人”。^①

三

关于袁应泰辽沈败亡一事，后世学者几乎众口一辞，皆从《明史》谓袁应泰“用兵非所长，规画颇疏”，以致城陷身死，丧师辱国。仅从就事论事的层面看，这一结论或有道理。然而，当我们站在明金对峙的历史大背景的角度，去审视袁应泰辽沈之败，这一结论未免失之浅薄。在此，笔者略陈管见，以期斧正。

（一）险恶的政治环境将袁应泰逼上“与辽相终始”的绝路

万历、天启两朝为有明一代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，皇帝怠政、党争迭起、宦官专权、兵饷不继，是贯穿于万历末至天启初的总体状况。1619年莎尔浒之战败后，皇帝惊恐无策，权臣各怀心腹，时以方从哲为首的浙党专权朝廷。内阁首辅方从哲被迫启用楚党人熊廷弼任辽东经略。然熊廷弼主守，虽有一年多与后金相持之效，却与主战的浙党大相径庭，加之熊廷弼“性刚负气”，因屡遭弹劾被逼辞职。此间，万历、泰昌二帝在一个月内连续驾崩，泰昌元年（1620）九月，年仅16岁的天启帝即位，继而朝廷又起“红丸案”、“移宫案”。此时，辽东战事又添危机，使朝廷财政难以支撑巨大的战争开支。在此多事之秋，天性好木技、年少无知的天启帝自然支持主战的方从哲，急切期望速平辽东之患。

袁应泰曾任辽东兵备参政，与熊廷弼间接共事，对辽东战事和熊廷弼的主张多

有了解，他一定清楚在当时的情形下，以明军的实力速胜是不可能的，同时他也清楚地看到了熊廷弼的遭遇。所以他才在接到任职辽东经略的当时就提请“辞免新命”，但他的请求没有获准。无奈的袁应泰只有被迫就任一条路，于是才有了“与辽相终始”的誓言。同时他也鉴于朝廷党争和政治迫害的严重后果，在同一件奏疏上意味深长地说“更愿文武诸臣无怀二心，与臣相终始”，表达了他对重蹈熊廷弼覆辙的担心。

（二）没有坚强有力的支持是袁应泰败亡的根本原因

决定战争的胜负，究其根本，在于双方的军事实力。就当时的情况看，明朝无论如何腐朽，其总体军事实力还是远远超过后金的。然而，明朝却在没有充分做好军事准备的情况下，贸然采取分兵合围的战略，导致1619年的莎尔浒之败。遗憾的是，明朝没有汲取教训。袁应泰任职辽东主帅后，朝廷除给他一个急于求成的目标和一把用来狐假虎威的尚方宝剑外，并没有下决心给予他坚强有力的军事支持。

首先是兵员不足。据《明熹宗实录》泰昌元年十一月乙亥，给事中周希令条议兵饷所言“兵必不可再募，惟有即辽阳十八万之众，分别上中下三等，责照信地训练”，可知当时明朝守备辽东的军队不过十八万人而已。同月乙未，给事中周朝瑞所言“奴酋非疥癣小疾也，累岁之所训练，数胜之所收集，今其众已不下十余万，且器极犀利，马闲驰逐，即以一兵当一贼，势恐不胜，况我兵合之不少，分之不多乎。”《明熹宗实录》记载，天启元

^①关于袁应泰任职辽东后的情况，凡重要的，在文中直接表述文献出处，其他见《明熹宗实录》泰昌元年九月至天启元年三月、《明史·袁应泰传》、《明史·熊廷弼传》。

年正月，袁应泰曾请调“各镇家丁一万名，赴辽应用，以备战守”，然而，至天启元年三月沈阳城破时，这部分军队仍未到位。从上述史料看，明军仅在数量上略占优势，而军事素质则远不如后金。至于明军士气低落、兵将不和等等问题学者已多有论及，此不赘述。

其次是多方掣肘。袁应泰名为辽东主帅，其实他的军事指挥权是有限的，将领任命、军队调度均需获得朝廷批准。如在沈阳城破的关键时刻，袁应泰“欲撤奉集、虎皮之兵，并守辽阳”，需请示兵部“覆议得旨”，方可调兵。

面对如此困难局面，袁应泰岂能速战而胜，岂有不败之理。

（三）未能确定符合战场实际的攻守方略

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袁应泰辽沈之败的直接原因既有战略目标的脱离实际，也有战术指挥的不当。

关于战略目标脱离实际，前文已论及。这里仅补充一点：收复抚顺的计划就当时情况而言，是不符合实际的，虽然这个计划因金军突然发动辽沈之战而未能实施。抚顺位于沈阳东约三十公里，地处辽东山地的浑河河谷，是通往后金政权中心的军事重镇，收复抚顺，对于日后剿灭后金确有重大意义。但是，这个计划超出了明军的实力。以当时明军的状况，且不说能否攻下抚顺，即便一时攻下，也难以长久固守。原因是，后金士兵生长于辽东山区，地形熟悉，野外生存能力和战斗力极强，特别是骑兵具有明军所不具备的快速

机动能力。如果明军在孤悬于山区的抚顺设防，势必造成兵力分散和军资供给困难，辽东防线反而会被各个击破。

关于战术层面的问题，笔者同意前人观点，一是纳降蒙古灾民，导致间谍与后金军里应外合，攻破辽沈二城；二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，以不善野战的明军出城迎战，遭致惨败；三是一改熊廷弼严法整肃军纪的做法，“以宽矫之，多所更易”，致使部队军纪松懈。

关于袁应泰败亡，尚有一论。袁应泰自泰昌元年（1620）十月受命经略辽东，到天启元年（1621）三月兵败身死，前后仅半年时间。在如此短的时间里，完成辽东东部和北部的敌情勘察，做好正面战场至少从盖州到沈阳近二百里战线的布防，并按照朝廷速胜的要求，研究制定光复辽东的作战计划，这对于没有实战经验的袁应泰无疑是一件力所不及的事。

综上所述，袁应泰身出书香世家，坚守“天地正气”之祖训，勤于政事，精敏强毅，清正为官，勇于担当，尤以治水事绩为后世称道。在晚明末世之秋，尚有如此品格者，实为难能可贵。辽东事急，群党相讧，袁应泰受命于难，独撑危局，危难关头，凛然殉国，更可谓气壮山河。天启四年诏书称其“鞠躬尽瘁”、“纤尘不染”、“义胆忠肝”、“浩气塞天”，用尽褒奖之辞，足见袁应泰事迹对当世的重大影响。时至今日，为国为民竭尽心身的袁应泰依然令人缅怀之至。

【责任编辑：董丽娟】